

杜威与中国

元青



人民出版社



杜 威 与 中 国

元 青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与中国/元青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ISBN 7-01-003423-0

I. 杜…

II. 元…

III. 杜威, J. (1859~1952)-哲学思想-影响-中国-研究

IV. B712.51

杜威与中国

DUWEI YU ZHONGGUO

元 青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01-003423-0/B·283 定价:18.00 元

序

如果要论 20 世纪美国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名人,杜威(John Dewey)大概是首屈一指了。他选择五四时期最有利的时机来华讲学,使他的实验主义(许多人习惯上称之为实用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在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产生了信奉其思想和学术的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伯苓等一批有作为、有号召力的名家。50 年代初期,为了肃清杜威的思想影响,发动了全国性的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运动,杜威也在被批判中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那时的一代中国人是在大批判中知晓并研究杜威的。这无疑从反面扩大了杜威在华的知名度。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在摆脱了极“左”的思想束缚和僵化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之后,很多学者以开放的姿态去重新研究胡适及其老师杜威的思想和学术,出现了不少新观点和新方法,立论新颖的论文、图书不断涌现,杜威的思想、学术及其在中国的弟子们,再一次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国人关注和研究杜威,已经有 80 多年的历史了。这种文化现象,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是不多见的。

从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来看,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异质文化的交流是相当困难的,它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的传播机制和接收机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可能变为现实。所谓的传播机制,首先是文化本身的高深性和实用性;其次是传播手段的可行性;第三是选择时机的准确性。所谓的接收机制,则包括对这种

外来文化的渴求或曰强烈的需求性;接收这种文化载体的特殊知识群体的基本素质的可承载性;接收手段和方法的科学性等。当然,这只是从普遍和一般的情况来讲的,具体运作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特殊情况,再加上文化本身时隐时现的模糊性,就并非所有的文化交流事件都可以很清晰地讲出个一二三来的。不过,杜威和中国的文化关系,则是良好的传播机制和优良的接收机制的有机融合,从中可以找出一些闪光的亮点。

杜威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西方思想家和学术大师,他的经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体系、工具主义的真理观、以大胆怀疑为出发点的批判精神和实证为本的方法论、教育和社会紧密结合的教育理论、社会进步是由多元因素决定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和平改革的社会历史观等,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交替的几十年中,风靡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先进的中国人从振兴中华的愿望出发,自然会去了解杜威,研究杜威,向苦难的祖国介绍杜威。20 世纪初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拜在那里执教的杜威教授门下,潜心学习,认真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中国文化状况,经过鸦片战争以来近 80 年的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已经为杜威思想和学术的登陆中国准备了条件。鸦片战争后的“师夷之长技”思想引发了洋务运动对西方科技和工业技术的引进,物质文化层面开始向近代转化;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则开始了制度层面的文化更新,民权和共和理念逐步变为中国人追逐的主要目标;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及稍后的五四运动,打出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标志着要从文化的深层方面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演进的梁启超所总结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转型时,从物质、制度到文化相递进的三个阶段。中国文化近代化程度的提高,必然扩大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传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扫荡,

大大地削弱了封建文化的影响力,为西方文化的大踏步进入中国扫清了道路。随着 20 年代中西文化大论战的展开,进一步拓展了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生存空间。杜威恰在中西文化大交汇的千载难逢的时候涉足中国,就如虎添翼,所向披靡。而且,这时的新知识群体和 50 年前相比,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高。洋务运动时期萌发的新知识分子,不仅数量少,而且多局限于科技领域。辛亥革命时期初步形成的新知识群体,虽然有许多新特点,但暴露出不少起步阶段的弱点,诸如旧科举遗毒尚存、世界知识薄弱、文化构成单一等。杜威 1919 年来华时的知识界则队伍相对整齐、整体素质较高,同时思想活跃、渴求新知。至于留美归国的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则成长为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不断传播其老师杜威的学说。1919 年 2 月,当他们得知杜威往日本讲学的消息后,就迫不及待地邀请其师到中国来。4 月,杜威到达中国后,在他的一帮弟子的精心安排下,两年多的时间里,走遍了 14 个省市,作了二百多次演讲,《东方杂志》、《晨报》等有影响的报刊纷纷刊登杜威的演讲稿,介绍其学说的各种图书也接连出版。此后,在 30 年代前后,胡适等人身体力行,或著书立说,或发动平民教育运动,或办杂志、建大学,大力推广杜威的思想和学术。这批人也在宣传乃师的思想和主张的过程中名声大振。这又反过来抬高了杜威。人们习惯上讲“名师出高徒”,其实高徒也总是抬名师。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总之,杜威选择五国时期将其学说嫁接到中国,恰逢其时;他的讲演方式以及弟子门的传播手段和接收方法,更是十分高明;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交流机制,又行之有效,颇具哲理。杜威学说能够成为 20 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巧妙结合。

本书的作者元青,多年来一直对中外文化交流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早在和我合写《梁启超传》的时

候,他就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梁启超关于中西文化的一系列论述,详细评说了梁的文化交流理论及其实践,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随后又给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讲授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选修课,已有8个年头了。在我主编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中,他独立承担了民国一卷,写出了近50万字的民国中外文化交流史。在博士论文的选题时,自然就集中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了。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论证,最终选定杜威与中国的文化关系为研究重点。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顺利写就了博士论文,受到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在此基础上,他又利用往韩国作一年高级访问学者的机会,进一步修改,完成了这部新著。通读全书,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文化交流的一般理论为基本出发点,从中美文化交流的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着眼,通过杜威五四时期的中国之行的典型个案研究,较为准确地深入探讨了杜威学说与中国文化的辩证关系。具体表现在:1. 关于文化交流的理论的分析和具体应用,尤其是文化的传播和接收机制的哲理的阐述。2. 杜威学说的价值判断及世界定位。3. 杜威在中国演讲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4. 杜威学说与中国二三十年代社会变迁、政治变动、教育改革和学术创新的关系,特别是与其弟子们思想和行为的内在联系等。概而言之,该书是一部富有新意的学术专著,不仅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而且拓宽了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为生机盎然的史学界增添了一些新绿。

李喜所

2001年5月12日于南开大学



作者简介

元青，天津市杨柳青人，1963年生。198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99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出版著作《梁启超传》（合著）、《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华民国卷》，发表《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典型意义》、《民国时期的中国留德学生与中德文化交流》等论文20余篇。

目 录

序	李喜所(1)
引 言	(1)
一、研究意义	(1)
二、研究现状	(5)
三、基本思路和研究重点	(9)
第一章 杜威:具有世界影响的实用主义思想家	(14)
一、时代·生涯·影响	(14)
1. 杜威所处的时代	(14)
2. 杜威生平与学术历程	(17)
3. 杜威的世界影响	(24)
二、杜威思想概观	(28)
1. 哲学思想	(28)
2. 教育学说	(40)
3. 社会政治思想	(48)
第二章 杜威的中国之行	(53)
一、足迹遍中国	(54)
1. 来华缘起	(54)
2. 巡回演说	(60)
二、杜威重要演讲	(67)
1. 《美国之民治的发展》	(67)
2. 《现代教育的趋势》	(71)

3.《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76)
4.《教育哲学》	(82)
5.《伦理演讲》	(87)
6.《思想之派别》	(95)
7.《现代的三个哲学家》	(99)
三、中国发展之路:杜威改革中国的设想	(104)
1.建设民主政治	(104)
2.大力发展实业	(108)
3.中西文化融合	(111)
第三章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五四思想界	(117)
一、思想界的实用主义热潮	(117)
1.杜威演讲稿充斥报端	(117)
2.介绍研究文章连篇累牍	(122)
二、实用主义思潮何以风行	(126)
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需要	(126)
2.与中国传统的相近性	(130)
3.中美关系相对友好	(131)
三、杜威实用主义对五四思想界的影响	(136)
1.各派知识分子奉为指导思想	(136)
2.对科学民主思潮的推动	(142)
3.实用主义与五四新知识界的思想论争	(147)
四、杜威实用主义在五四哲学思潮中的位置	(159)
1.西方哲学思潮的涌入	(159)
2.实用主义在五四思潮中的位置	(167)
第四章 杜威教育理论与20年代的中国教育	(171)
一、杜威教育理论的传播	(171)
1.中国教育界的“杜威热”	(171)

2. 杜门弟子与杜威教育理论的传播	(179)
二、杜威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改革	(192)
1. 学制改革	(192)
2. 新教学法的实施	(200)
3. 平民教育运动	(209)
第五章 胡适与杜威实用主义	(216)
一、终生服膺杜威	(216)
1. 拜师杜威门下	(216)
2. 鼓吹杜威学说	(220)
3. 终生服膺杜威	(228)
二、杜威学说的传人:胡适哲学教育思想简析	(231)
1. 哲学思想	(231)
2. 教育思想	(239)
三、实践贯彻杜威实用主义	(244)
1. 学术研究	(244)
2. 参与学制改革	(250)
第六章 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和扬弃	(254)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	(254)
二、杜威教育理论的改造与发展	
——以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为例	(263)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和征引书目	(276)
后 记	(284)

引 言

一、研究意义

近代中国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扬民主科学的伟大旗帜,以解放人、解放人的思想为宗旨,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猛烈批判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使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新旧思潮大激战、中西文化大交汇、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崭新局面。思想的变革是社会进步的先导,也为文化创造开出无数法门。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有力推动下,在近代以来出现的各种新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新文学、新学术、新教育、新科学、新风俗、新价值观进一步向前发展,五四新文化从此诞生。

正是在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处于高潮的历史背景下,当时西方世界的一位极有影响的思想大师、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被中国新知识界隆重邀请到中国。在此后两年零两个月的时光里,杜威不辞辛苦,南下北上,在中国各地巡回讲演,足迹遍及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广东等十四个省市,作了大小演讲 200 多讲,系统宣传了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说。在杜威讲学的推动下,实用主义形成一股热潮。学子们竞相阅读和翻译杜威的著作,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刊登杜威的演

讲录,知识分子纷纷撰文介绍杜威的学说,各级学校大力试验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的名言也在知识界到处传诵。在五四后的一段时间里,实用主义成为思想领域、教育领域的主导潮流。它极大地促进了民主科学思潮的传播,为五四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武装和思想指导,活跃了知识界的思想论争,促进了新学术研究的发展;它成为新学制改革的灵魂,指导了学校课程、教材特别是教学方法的改革,影响和推动了平民教育运动的展开,为有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杜威这样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亲到中国讲学,其停留时间之长,所到地域之广,宣扬自己学说之系统,发生影响之广泛,其他任何一位外国思想家、学者都无法望其项背。毫无疑问,杜威与中国的关系是近代思潮史、教育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上最有意义的课题之一,缺乏对这一课题的描述与评价,这些领域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

然而,在以往的教科书和有关著述中,我们感觉不到这一课题的分量和对这一课题的公正评价。在 50 年代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中,杜威因和胡适的特殊关系也受到尖锐批评,他的中国之行被说成来华散布实用主义毒素。在 1954、1955 年两年发表的 300 余万字清算的文字中,几乎每一篇都要骂到杜威。有的文章说“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美帝国主义阶段所产生的最反动的一种哲学”,“杜威是华尔街老板以最高的代价豢养的”。有的文章讲“假使我们要批判旧教育思想,我们首先要批判杜威”。还有人著文分析“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毒素”在中国散布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杜威自己来华讲学,宣扬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反动的教育思想;通过杜威当年的一个反动思想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留学在那里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到解放以前,这三十多年来,上万的留学生带回来杜威反动实用主义主观唯心论思想和杜

威反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这种批判固然是那个年代特定的政治、学术环境的产物，有着冷战、抗美援朝、肃清亲美崇美思想的特殊历史背景，应历史地看待这段公案。但这种批判在一些方面开了坏的先例，如将学术问题政治化，非历史地批判历史人物，铸成了评价当代西方哲学、西方教育的极左模式。这显然是需要反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批判的消极后果，影响所及，直到 90 年代，学术界还有人认为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提出要肃清杜威实用主义流毒。还有人认为 50 年代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彻底结束这种明显具有“左”的色彩和过去特定的思想方式支配下所形成的一些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无疑需要重评杜威，对其与中国的关系也需要重新给予价值重估。而任何价值重估如果没有以客观的历史判断作为基础，都将失去其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杜威中国之行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杜威中国之行已过去了 80 年，杜威逝世也已近半个世纪，今天的时代已然不是过去的时代。但是杜威集大成的实用主义哲学和他创立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份思想文化遗产，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并未过时，他旅华巡回演讲中所倡导的一些思想观念，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譬如，在思想信仰和思想方法上，杜威倡导知识、思想自由，认为这不仅是民主政治应有之义，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之必需。他告诫人们，社会是变迁的，想用一种思想来规范全社会、全国是不可能做到的，“聪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应“以容忍的态度，提倡思想自由”。同时，他希望人们独立思考，独立评判，不迷信权威，不崇奉教条，不固执成见，用“存疑”的眼光“重估一切价值”。这些思想符合人类思想的发展趋势，也准确把握了一个现代人的内在世界所应有的精神风貌。又如，杜威对科学的提倡不遗

余力,他不仅注意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更着力阐述科学进步的意义,认为它会带来观念的变革,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经济与社会进步,他号召人们培养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态度,掌握科学的方法。这些思想在大力倡导“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的今天,显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再如,他在关于教育的演讲中,突出强调了教育应加强与社会的联系,指出教育是社会的,也是为了社会的,社会进步需要教育,教育离不开社会生活。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科学地界定了教育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以及教育要“面向现代化”的方针是完全合拍的。他提倡的“儿童中心”、“学生中心”的观点,充分体现了教育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摒弃了传统教育把学生当作知识容器的弊端,对调动学生的潜能,尊重和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大有裨益,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加以借鉴的。至于他反复宣扬的一些哲学观点,也有合理之处和某些积极内容,理应加以吸收。如他把经验看做人的遭遇和行动的过程,在人的认识和行动的关系上,以行动为中心,强调人是行动的主体,强调人的行动的能动性,显然包含着激励人们积极奋斗、敢于进取的精神;他主张看概念、学说是否真理,关键要看其最终的功效和目的,这种以效用为中心的哲学,对于反对形式主义、反对重名轻实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大有好处。总之,在时隔半个世纪,当饱经沧桑的中国重新面对世界、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对杜威这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对他与中国的关系理应给予高度关注。

历史与现实都要求我们对“杜威与中国”这一课题进行考察和总结。

二、研究现状

对杜威中国之行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厘清杜威与中国的关系,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上面谈到的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缺乏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这一方面的成果几乎等于空白。倒是那些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中对杜威在华“散布实用主义毒素”进行的清算,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某些有用的信息。此外,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一些杜威哲学原著,如许崇清译的《哲学的改造》,傅统先译的《经验与自然》、《自由与文化》等,为杜威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以新的姿态向世界开放,一些外国思想家重新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关注,“杜威与中国”这一课题也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片断的、基础性的研究成果。一是在部分哲学史、教育史、教育思想史著作中,对这一课题的某些内容作了阐述。如袁伟时撰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就专列一章“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其中对杜威来华传播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及其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作了简要评述,内容之广泛和观点之深刻都超过以往同类著作。又如金林祥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也专列一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五四前后以杜威来华为契机形成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及其对中国新教育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提供了杜威与中国新教育关系的一些线索,较有参考价值。二是在近年出版的某些人物传记和人物思想研究著作中对这一课题的某些方面有所涉及。如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等胡适研究著作,对胡适与乃师杜威的关系、胡适传播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情况作了研究。童富勇、胡国枢撰著的《陶行知传》(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崔运武撰著的《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等著作则对杜威教育学说影响下的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新教学法的实施情况作了一些叙述。这些研究只是涉及到杜威与中国关系的某一侧面,虽不很完整系统,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是有个别的学术论文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思潮时谈到了实用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如章清的《实用主义哲学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一文,对实用主义风行于五四时期的原因作了探讨,较有理论深度。四是作了某些资料搜集整理工作。1985 年,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黎洁华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发表了《杜威在华活动年表》。这份年表从五四时期的大量报刊资料中钩稽爬梳,择取了有关杜威在华行踪、演讲及中国各界反响等方面有价值的资料,对杜威旅华两年多的具体情况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对考察杜威中国之行的过程很有帮助,是一种扎实的基础性工作。

上述成果无疑是国内学术界对杜威与中国关系问题研究新的突破。但是,就这一课题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意义来说,这些成果显然不足以充分体现它的应有分量。至今,学术界尚没有一部以杜威中国之行及其影响为主题全面阐述杜威实用主义与中国关系的专著。已有成果只是分别涉及到这一课题的某些侧面,缺乏研究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些成果所涉及的部分史实如杜威来华邀请单位、杜威来中国的具体日期,杜威改革中国的设想,杜威在中国讲学的具体内容等,或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尚待厘清和考订;这些成果取材比较狭窄,对反映这一课题的某些重要史料如杜威夫妇写给留在美国的女儿的信件、杜威旅华期间在美国国